

歷史人物

序

我是有點歷史癖的人，但關於歷史的研究，秦以前的一段我比較用過一些苦功，秦以後的我就不敢誇口了。中國的歷史實在太長，史料也實在太浩瀚，以一個人的有限的生命，要想把全部都要弄精通，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吧。

不過關於秦前後的一些歷史人物，我倒作過一些零星的研究。主要是憑自己的好惡，更簡單地說，主要是憑自己的好。因為出於惡，而加以研究的人物，在我的工作裏面究竟比較少。我的好惡的標準是什麼呢？一句話歸宗：人民本位！

我就在這人民本位的標準下邊從事研究，也從事創作。但在事實上有好些研究是作為創作的準備而出發的。我是很喜歡把歷史人物作為題材而從事創作的，或者寫成劇本，或者寫成小說。在幾篇短篇小說中，我處理過孔丘孟軻老聃莊周秦始皇楚霸王賈誼司馬遷。在幾部歷史劇中，我處理過聶政與聶嫫，屈原，信陵君與如姬，高漸離等等。但有的創作流產了，而只剩下了些研究文字。在本書裏面所收集的，如萬寶堂，申三百年祭都是。我還有一篇釣魚城訪古，也是想把釣魚城的故事寫成史劇的調查工作。史劇沒

有寫成，那篇調查記，論性質儘可以收在這兒，但已經被收進今昔蒲劍裏面去了。

我對於王安石是懷抱着一種崇敬的念頭的，實際上他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在中國歷史上很難得找到可以和他比配的人。他有政見，有魄力，而最難得的是他是以人民爲本位的人。他在歷史上出現得太早了，孤立無輔，形成了一個屈原以來的歷史上的一大悲劇。這悲劇不限於他晚年的失意，而是在他的新政廢止之後，宋室卒於遭到異民族的顛覆，中國的農民老是不得翻身，又苦了一千年。

我很有意思把王安石司馬光蘇軾三個人拿來寫成一部三人行，以王安石代表人民意識，司馬光代表地主階層，蘇軾作爲游移於兩端的無定見的浪漫文人。這些倒也並不是我一個人的主觀見解，他們三個人，在當時實在是代表着這樣的三方面。以司馬光爲代表，漫衍而爲南北兩宋及其後的道學家，他們在表面上雖然打着儒家的招牌，吃的是孔孟的殘飯，實際上他們是把儒家形式上最壞的一些成分，和道家的精神結合了。那些鼎戴着司馬光的所謂大儒，周程朱張輩，認真說只是一些道士。在秦漢以後要找一位純正的儒家代表，恐怕就只有一位王安石吧。

王安石被埋沒了一千年，近代人漸漸知道他的價值了。然而他在思想史上所佔的地位，就在我們新與歷史家的頭腦裏似乎都還抵不過司馬君實和周程朱張。一種傳統觀念一被形成，要打破實在是一件

不容易的事。

三人行沒有寫成，王安石的研究，在本書所收的實在只是一點輪廓。關於他，我在重慶時曾經作過幾次講演，自己覺得講得也還不錯，然而紀錄得實在太簡單了。那差不多只是王安石的糟粕的糟粕。不過要了解王安石的精神也不在乎要有更詳細的文字，只消舉出他的兩句話已就足供我們受用。

一、『某自諸子百家，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頂重要的就是這『農夫、女工無所不問』，這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向老百姓學習』嗎？

二、是他的政策的基本用意是『推制兼併，均濟貧乏』。這不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打倒土豪劣紳，使耕者有其田嗎？

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經引起過軒然大波的一篇文章。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同情了農民革命的領導者李自成，特別是以仕宦子弟的舉人而參加並組織了革命的李巖，這明明是帝王思想與人民思想的鬭爭，而這鬭爭我們還沒有十分普遍而澈底地展開。

關於李巖，我們對於他的重要性實在還敘述得不够。可惜關於他的資料是毀滅了，我們可以堅決地相信，他一定是一位懷抱着人民思想的人，須知他是主張『均田』的。唯其這樣，所以他能够與李自成合

夥，他的參加農民革命是有他自己的在思想上的必然性，並不是單純的『官激民變』。

認識了李巖的這層重要性，我們請把他和約略同時的一些學者或思想家來比較一下吧。例如顧炎武在前是被視為承先啓後的一大鴻儒，特別被人尊重的是他有民族思想，他不受滿清的羈縻，而且還有組織地下運動的傳說。但他對於李自成是反對的，可以證明他只有民族思想而無人民思想。

又例如王船山，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近來是够被強調着，駸駸乎駕諸顧炎武之上了。他的民族思想也異常強烈，曾參加南明的抗清鬪爭，明亡隱於苗洞，堅苦著書，書也到了兩百年後才爲曾國藩所刊行，這些往事的確是可以增加人對於他的崇敬的。然而在我看來，他也只富於民族氣節而貧於人民思想。

這兒有這麼一段事實。張獻忠到了湖南，慕王船山的大名，特別禮聘他，請他參加他的隊伍。王船山躲起來了，不肯和草寇合流。張獻忠便用綁票的方式把船山的父親捉了來，要挾他。弄得船山沒法，只好毀傷自己，被肩輿抬着去見張獻忠。張獻忠看他那樣固執，便把他父子一同放了。據這個故事看來，我們可以了解張獻忠也並不如一般傳說所講的那麼胡塗，而王船山的固執倒是可以驚人的。請把這種態度和李巖比較一下怎樣呢？李巖不是可以更令人嚮往的嗎？

我本來想把李巖寫成劇本的，但沒有成功。已經有好些朋友把甲申三百年寫成劇本了，可以省得我費事。不過我還有一種希望，我們應該把注意力的焦點，多放在李巖的悲劇上。這個人我們不要看他只

是一位公子哥兒的讀書人，而是應該把他看成為人民思想的體驗者，實踐者。雖然關於他的資料已經遭了湮滅，在思想史上也應該有他的卓越的地位的。

郭沫若先生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目次

改版說明

序

屈原研究

論曹植

隋代大音樂家萬寶常

王安石

甲申三百年祭

夏完淳

魯迅與王國維

一

一四

一七

二〇

二六

二四

二八

論郁達夫……………三〇一

論聞一多做學問的態度……………三二

屈原研究

一 屈原身世及其作品

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偉大的詩人要推數屈原。他是生在戰國後半期的楚國的。司馬遷的史記上有一篇屈原賈生列傳，前半部便是傳的屈原。我現在把那大要摘錄在下邊：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強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原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原。』

『屈原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屈平既細，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屈原，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願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納。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

「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這便是屈原傳的大略。在傳的最後司馬遷還有幾句評論是：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段文字，因爲他把天問、招魂、哀郢諸篇，和離騷一樣，都認爲是屈原的作品。

自從有了司馬遷這篇評傳之後，兩千年來討論屈原的人大都奉以爲圭臬。沒有人懷疑過。但在近幾年來卻是大大的發生了問題，竟連屈原的存在都要加以否認了。這個問題雖然是新發生出來的，但既有問題發生，如在未能解決之前，又來肯定着對於屈原要作進一步的研究，那等於是在砂上築臺，全部的努力會有成爲空費的危險，所以我在這兒要多費一點筆墨來討論這個問題，看看懷疑的人所持的理由究竟是否充分，而屈原這個人究竟是否存在。

提出了這個問題的人，第一個是四川的廖季平，據謝无量的楚詞新論上說：

『我十年前在成都的時候，見着廖季平先生，他拿出他新著的一部楚詞新解給我，說「屈原並沒有這人。」他第一件說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是不對的，細看他全篇文義都不連屬。他那傳中的事實前後矛盾，既不能拿來證明屈原出處的事蹟，也不能拿來證明屈原作離騷的時代。……他第二件拿經學的眼光說楚詞是詩經的旁支。……他以爲詩經本是天學，所講的都是天上的事，自然楚詞也是一樣。所以有那些遠遊出世的思想，和關於天神魂鬼的文詞。……他第三件說離騷首句「帝高陽之苗裔」是秦始皇的自序。其他屈原的文章多半是秦博士所作，史記「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及行遊天下，傳令樂人歌絃之。」（秦皇三十六年）……』

廖先生的楚詞新解我還沒有看見過，他的詳細的論證我自然無從知道，但在這個簡單的轉述中他的主張的要點是揭示出了。

其次是胡適的讀楚辭，對於屈原傳也表示過同樣的態度。他說：

「屈原是誰？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發過問的。我現在不但要問屈原是什麼人，並且要問屈原這個人究竟有沒有。爲什麼我要疑心呢？因爲第一史記本來不很可靠，而屈原賈生傳尤其不可靠。（子）傳末（案在賈生傳末）有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司馬遷何能知孝昭的謚法？一可疑。孝文之後爲景帝，如何可說「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丑）屈原傳敘事不明。先說「王怒而疏屈原」，次說「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懷王曰：何不殺張儀？王悔，追張儀不及。」又說「懷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又說「頃襄王立，以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原既嫉之，雖放流，聽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又說「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既疏了，既不在位了，又「使於齊」，又諫重大的事，一大可疑。前面並不會說「放流」，出使於齊的人，又能諫大事的人，自然不會被「放流」。而下面忽說「雖放流」，忽說「遷之」，二大可疑。「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昭睢諫的話。「何不殺張儀」一段，張儀傳無此語，亦無「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等事，三大可疑。懷王拿來換張儀的地，此傳說是「秦割漢中地」，張儀傳說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說是「秦分漢中之半」，究竟是漢中是黔中呢？四大可疑。前半稱屈原，後半稱屈原，五大可疑。」

胡適的文章我因爲手頭無書也還沒有窺到他的全豹，這一段也是由楚詞新論所轉錄下來的。他所揭出的疑問的確是很值得令人懷疑，我想廖先生以爲屈原傳不可靠，大約也就是根據的這些疑竇吧。

這兩位先生的懷疑是應該首先解決的，我們應該來當一個公正的審判官，要看是司馬遷可靠，還是廖胡兩位可靠。

廖胡兩位先生，特別是胡適，對於屈原傳所提出的疑問，驟看都覺得很是犀利，但仔細檢查起來，卻一項也不能成立。（子）項所列的那一段話，早就有人說過是『後人所增』●而那增竄過的文字也還有傳譌，『孝文崩』應該是『孝景崩』的錯誤。（丑）項的五大可疑也疑得不很周到。第一層的既疏了，既不在位了，而又使於齊，又諫重大的事，我們如想到現在的一些要人下野出洋且發抒偉論的近事，便可以不費筆墨地得到了解。第二層的『放流』兩個字當成流謫解，是後來的人講錯了的。其實『放流』就等於『放浪』，並不是說屈原在楚懷王時便遭過流刑。第三層的『秦虎狼之國不可信』的那兩句話，本來是很平常的話，昭睢可以說，屈原也可以說，就如現在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三尺童子都可以喊叫的一樣，那是毫不足怪的。但關於這一層更有人說昭睢就是屈原的。楚詞新論上引劉申叔的話說：

又明說

『昭姓源流不可考，後世亦無昭姓。惟屈景二姓是楚同姓。史記所說屈原諫懷王及使齊的話，的轉述中他的主屈原名字，恐怕昭昭就是屈原。古晉本通。』

這個見解的根據是非常薄弱的。莊子庚桑楚篇上說：『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所說的就是楚國的『三閭』屈景。昭，甲氏就是屈氏，說它是音變固可以，●說它是字誤也未嘗不可以。據此可見昭，屈原本是二氏，昭是楚昭王的支庶，●所以說是『著戴』，戴是代的假借。屈是楚武王的兒子屈瑕所封的采邑，●所以說是『著封』。三者是完全不同的。莊子齊物論中有善鼓琴的昭氏，其名爲文，●還有他的兒子也是承繼着父業的，可見昭氏並不是沒有流傳。總之昭，屈不能說就是屈原。他與屈原同時而且大約是同志，所以他們說話相同。使齊時他是做了屈原的副使或隨員，也是說得過去的。

至於第三大疑問中言屈原傳中所有的事爲張儀傳所無，這是司馬遷慣用的詳略互見的筆法，毫不

●馬敘倫說『甲借爲屈，音同見紐。』（莊子義證第二十三卷十三葉。）

●楚昭王名珍與魯昭公同時，在春秋末年。

●楚武王與魯隱公同時，在春秋初年。

●列子湯問篇有師文學鼓琴事，俞曲園謂即昭文。呂氏春秋季子守篇有鄭太師文鼓瑟事，馬敘倫也疑是昭文。（見莊子義證第二卷十二葉。）當是楚國的人做了鄭國的官。

足怪。第四大疑問的黔中和漢中是胡適太着急，把原書看脫了一半。張儀傳上是說「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黔中是楚地，到了頃襄王二十二年才爲秦所取。「武關外」便是指的漢中，三篇文章並沒有衝突。只是張儀傳多提出了「秦欲得黔中地」的事實，後來楚也沒有給他，不用說武關外的漢中也沒有到楚國手裏。第五大疑問的前稱屈原，後稱屈原，更不能成爲疑問，因爲「屈原者名平」，司馬遷在開首一句就交代清楚了，稱平稱原本是兩可。前半有「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也明明稱的是原。而且「高平曰原」見爾雅，「上平曰原」見公羊。昭元年傳，名平字原也是很合乎古訓的，不能說司馬遷是誤把兩個人合成了一個人。

據上所述可見胡適對於屈原傳所發出的疑問均不能成立，更推到廖季平所懷的疑問大約也不過如此。若要更進一步，疑及屈原這個人的存在，那就未免飛躍了。本來屈原和現在已經相隔了二千多年，所有實質上的物證都是消滅了的，假定他的屍首被撈出而埋葬，將來有那樣的幸運把他的墳墓發掘了——傳說秭歸縣的屈原有屈原的衣冠冢，但這是不可信的，只是後代的人所假託的東西——能够得到多數地底的證據，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但在目前仍然是只好信憑着和屈原相去不遠的人們的著述。司馬遷並不是對於屈原關心的第一個人，在他之前有長沙王的太傅賈誼和建都在楚末的舊都壽縣的淮南王劉安。賈誼有弔屈原的賦，收在屈原傳裏面。賦體既仿效楚辭，且多摹擬離騷的辭句，而賦中又明明說：

『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

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

屈原在賈誼的耳目中是存在的。賈誼離屈原僅百餘年，所寄寓的地方又是長沙，曾經親眼見過屈原的故老都是有存在的可能的，關於屈原的遺說不用說是還十分新鮮。淮南王劉安是做過離騷傳的，●那篇傳雖然失傳，但在屈原傳中還保存有一部分，便是『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至『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的那一節。●淮南王既住在楚的舊都，他的門下又有不少的文人學士，關於離騷的來歷，他也必然是有所根據的。

●漢書淮南王安傳：『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博辯，善爲文辭，甚尊重之。……使爲離騷傳，且受詔，日食時上。』王念孫謂『傳當爲傳，傳與賦古字通。……漢紀、孝武紀、高誘淮南鴻烈解、鈇太平御覽皇親部十六引均作賦』（讀書雜誌四之九，六葉。）游國恩以爲傳或誤爲傳，傳又誤爲賦。（楚辭概論二七八頁。）案以游說爲近是。

●班固離騷序及文心雕龍辨騷均如是說。

還有楚辭裏的卜居、漁父兩篇雖由近人的研究判定了都不是屈原的作品，但那一定是屈原的後輩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所作。兩篇都寄託於屈原，那也剛好證明屈原是確有其人。

有了賈誼和劉安以及做卜居、漁父的作者楚人在前，屈原傳在細節上縱使有疏失和爲後人所竄改的地方，而在大體上是不能推倒的。更何況屈原的存在與否和屈原傳的可靠與否也沒有必然的關係，譬如從前的人說地球是方的，那自然是不可靠，然而我們不能因此就懷疑地球不存在。問題倒還是應該更進一步來討論離騷或其他認爲是屈原作品的幾篇究竟是不是屈原所作。

廖季平所說的『詩經本是天學』，『楚詞是詩經的旁支』，那些話可以說完全是亂說，楚詞和詩經的相關在下章中還有討論的機會，在這兒暫且不提。但他疑離騷是秦博士的作品，卻有他的相當的根據。在上面所揭出的他的證據之外，我也可以替他想出兩個證據。一個是『名余曰正則』的一句很像是在暗射呂政，這個證據在廖先生的著作中想來一定是有的，但秦始皇諱避政字，連正月都要改成『端月』，●那有他的臣下做詩敢於直用正字？又一個是離騷的文辭主於以六字爲句，和秦的『數尙六』頗相符，但這也只好說是偶然的現象。秦始皇時所做的一些有名的韻文，如泰山刻石、琅邪臺刻石、海上議、芝罘東觀